

吉田東祐言論集

第一集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一日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一日再版

吉田裕
言論集
第一集

著者 (日) 吉田東祐

出版者 中報社

發行者 中報社

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定價每冊中儲券三十元

外埠酌加郵費

序言

我在這六年當中，經常在痛苦地思索着，中日兩國人民，怎樣才能完全和解。正如日俄戰爭時一樣，能够達到相互信賴的地步。

我以前曾從事於實際工作，日積月累且加以整理的思想，從未發表過。今年三月，經申報社長陳彬龢先生的勸說，才把研究的一部份，發表在申報上。多少知道一些中國人對日感情的我，起初從未奢想，自己的文章定會受到中國人的歡迎。但說來很奇怪。其反響却相當大。中國讀者中有寫信勉勵我的，有寫信非難我的。這兩方面的信，每天都有數封映入我的眼簾。我從內心裏，時常感謝非難我的讀者們。因為我知道，中國人，尤其抗日派的中國人，以前並不注意日本人所寫的文章。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日本人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觀察中日問題，中國人的意見，沒有可能提出的餘地；於是便對日本人的言論，向持「馬耳東風」的態度。與這類中國人所持的消極態度遙遙相對，而挺身出來指責和抨擊我，即這一點，也可以證明他們的充分關心。

嘉哇赫魯拉爾·太爾氏在自己的自敘傳中曾說過下列的話：

「英國人通常在官場中，只限有關係的同一階級的印度人來往，跟真正印度人接觸的，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同時，縱使有那樣機會，英國人也不允許開誠佈公地暢談他們的內心話」。

幸而我是一個日本平民，在我的周圍有很多高談「暢談他們的內心話」的各階層好的中國朋友。

我經常和這些人交換意見，因而才能知道中國人對中日問題的見解。本書內的論文，全是根據朋友的見解寫成的。因此，如果本書在中日問題上能得到讀者同情的意見，那就是對我「暢談內心話」的中國朋友們的功勞。我不過是他們的介紹人。

前經北方阿圖島・南方瓜達卡那爾島的壯烈戰鬪，而且前大東亞戰爭，愈益呈現出劇烈絕頂的形勢。關於中日問題方面，也同樣，單純高談闊論中日親善，即能應付局面的時代，業已過去了。我認為在文化方面，也應當發揮阿圖島和瓜達卡那爾島的戰鬪精神。現在這本論文集，如能對於因大東亞戰爭現階段而更想認真考慮中日問題的中日兩國人士，少有裨益和供獻，則筆者幸甚。 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吉田東祐（漢譯）

序

吉田東祐先生是一位典型的日本學者，讀了他的文章，又覺得作者是一位具有政治天才熱愛國家的志士。不過，他的愛國心，還包含解放東亞民族的摯誠。他的文字之間，充分流露出對於在解放途中的中華民族的真摯之愛。同時，他更有清醒的頭腦，正確的判斷力，和縝密的思考，所以他的文章便具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

這裏，我們蒐集吉田先生最近撰述的幾篇論文，都應申報要求而作的，全部論文的内容，是以時局與政治為中心。而文化經濟以及社會等問題，也有論列。吉田先生旅華多年，以知華親華的日本學者態度，發揮他的思想和意見，也正是這一時代裏真正親華的友邦人士意見的代表。在這需要「中日協力完遂戰爭」與「中日文化交流實現永久合作」的時候，這本論文集的問世，深信有相當意義與價值的。

我在編纂之時，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必須向讀者與文化界提出的，第一就是吉田先生的好學精神，確是值得欽佩與學習。他除了職務上的工作時間以外，幾乎時時手不釋卷的。特別是中國的重要典籍，不憚艱難的研究。因此，他對於時局的洞達和對於中華民族內心的了解，絕不是偶然的。第二是他具有樸素和忠實的態度。對於中國問題，他絕對抑制自己的成見和感情，客觀和沉靜地去觀察，而且比較能夠虛心地聽¹¹⁹和自己反對的言論，特別是肯聽取一般老百姓和青年人的意見。

如果說吉田先生是今日日本學者的代表者，那麼，我們對於本國應該怎樣迫切的期待着同樣樸素無華，好學勤讀和忠實的學者啊！這本論文集的問世，如果幸而能够給停滯狀態的中國思想和文化界引起小小的波瀾而冲破停滯的現狀，那就是我們莫大的期待了！

陳彬蘇

三二，九，三〇。

吉田東祐言論集

目錄

中日問題全面解決的可能性·····	一
日本之對華文化政策與中國知識階級·····	二〇
鴉片戰爭的新意義·····	二九
國家興衰之道·····	三六
驗物價問題的嚴重性·····	四〇
中國知識階級的騎牆主義·····	四五
兩種親日派·····	五一
真正「日本通」與「中國通」的話·····	五五
怎樣諒解對方心理·····	五八
解決中日事變之曙光·····	六〇
對於交還租界的幾個意見·····	六九
心理長城·····	六九
言語上的政治性·····	七四

昇官發財

七六

宴會

七九

論中國餐

八二

中日問題全面解決的可能性

一 中日不斷鬭爭

英美人對於中日關係老早就說過：「日本強則中國弱，中國強則日本弱（Stronger Japan Weaker China Stronger China Weaker Japan）」，如把中日兩國人驅入亞洲的一角，而得不到其他出路，當然中日兩國間會形成這樣關係。凡認為中日前途將永久不斷的鬭爭者，我稱之為「中日不斷鬭爭論者」。「亞洲內幕」的作者約翰根塞，也曾引證美國著名外交家的觀察說，中日關係沒有「解決」可能。中日關係不能「解決」的理由，是因為下列三種矛盾作祟。

第一，日本需要領土，日本正在擴張領土中。擴張領土只有用征服方法才有可能。那末當然就會使這一戰爭成為長期戰。

第二，中國沒有擊退日本的實力，但中國是無人可以征服的。因此，這一戰爭將成為「不斷的」第三，日本與歐美國主義衝突，所以這一戰爭將擴大到所有的地方。

中日事變尚未解決，但竟發展到大東亞戰爭，表面上這好像「中日不斷鬭爭論者」的立場愈益正確。假如這一立場是正確的，正如已往德法的抗爭被英國所利用一樣，也正如巴爾幹的混戰被土耳其所利用一樣。中日間的不斷鬭爭，將永遠對英美有利。最近羅斯福與邱吉爾在華盛頓的會談，曾說戰後將使重慶成為監視日本的東亞憲兵。很明顯，這一聲明就是希望中日永久不斷的鬭爭。印度的回教

徒與印度教之不斷抗爭，才造成三萬英國人支配三萬萬印度人的可能。深明事理的人，甚至也不知道中日的不斷抗爭會造成英美支配世界的可能。果如英美人所言，中日兩國是命運註定永久抗爭麼？一言以蔽之，中日全面和平在現狀上看是絕對不可能麼？爲了知道這一點，首先就應當分析開戰以來抗戰運動，必須找出抗戰運動中發展着的主要傾向。

二 抗日運動的發動者

無論誰都曉得，中日事變開始前抗日運動最激烈者，是上海的救國會。一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中國人和日本人相信上海的抗日救國運動是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其實，這一運動的中心份子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主要是代表上海中小商工業資產階級的經濟要求，而逐漸擴大成的一種運動。

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日本輕工業的廉價商品源源不斷地傾銷於中國市場，而對中國中小商工業資產階級的生活，賜與極大的威脅。結果，當然中小商工業資產階級便起而提倡國貨，排斥日貨。同時，他們的經濟要求便和中共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要求合流，這也是當然的歸宿。但當時的抗日運動主要是城市裏中小資產階級的運動，中共政權下的農民層；對於這一問題並不感覺若何興趣。且抗日運動是在中國中小商工業資產階級大本營的上海，如火如荼，最爲蓬勃，這並不是偶然的。從救國會領導者的出身和職業方面看，也可以明瞭抗日運動的階級性。沈鈞儒，沙千里，史良等是律師，李公樸，鄒韜奮是出版業者，王造時是大學教授，這都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然而不同者，只有章乃器一人。章乃器是浙江實業銀行的副經理，雖然因此便有人給他冠以「左傾資本家」的名字（中國內幕），但他決不是資本家，而是銀行的高薪職員。

當時中國的大金融資本家，決不喜歡這一抗日運動。不待言，其政治方面的代表蔣介石，主張抗日是他國家統一政策的一個手段，但他的抗日政策是「先安內後攘外」，即首先平定中國內部，更具體一點說，他的抗日主張是以消滅共產黨為前提的。蔣介石的主張是「剿共高於一切」。與此相反，「抗日高於一切」的救國會主張，當然與蔣介石的國家統一政策，直接對立着。所以在主觀上我們不管救國會的意向如何，但在客觀上是代表反對蔣介石的立場。但蔣介石對於救國會並不能像對中共那樣實行直接鎮壓，這因為蔣介石為抗日救國而主張國家統一政策，如實行鎮壓，則陷自己於矛盾中。

二 抗日運動與「各黨各派」

救國會所發動的抗日運動，在意識上是具有反對蔣介石傾向的，這一點可由各方面看出來。尤其不應當放過，中國的失意政客特意利用抗日運動為反蔣運動的手段這一事實。當時蔣介石所發動的全國統一運動，不僅以中國共產黨為當前的大敵，且隨着運動的進展，而也以消滅蔣介石嫡系國民黨以外的各黨各派為其主要課題。否則，蔣介石的國家統一就失掉意義。蔣介石的這一運動愈進展，而西南軍閥，西北軍閥，東北軍閥等的地位，愈覺不安。但他們沒有直接反對蔣介石這種統一運動的名義。目個別發動反蔣運動，環境也不許可，他們為了突破這一難關，便支持當時民心所歸的救國會之抗日運動，這也許是最賢明的政策。尤其隨着抗日運動的突飛猛進，如能實現共產黨主張的「抗日人民國防政府」之計劃，則彼等軍閥認為也有參加其中的機會，且由其他各黨各派之聯合，而能牽制蔣介石。當時積極支持救國會的，除中國共產黨外，還應當特別指出張學良（東北軍系）閻錫山（山西軍系）白崇禧，李宗仁（西南軍系），馮玉祥（西北軍系），李濟深，陳銘樞（十九路軍系），宋慶

齡（第三黨系）等等。這批軍閥及失意政客不約而同地首先在國民黨人中支持救國會者，從其經濟關係上來看也可以知道。他們擁護抗日，毫無疑問，多半都帶反蔣彩色，是由於保持自己地位的動機出發。

當時國民黨內有聲望的人士支持救國會者，則有孫科和宋子文等。當時孫科和宋子文也都不滿意蔣介石，大家都知道，他們因在黨內早已一落千丈而陷於失意的深淵。

總之，救國會所發動的抗日運動，決不是單純以民意為根據，決不要忽略民意被反蔣黨派的私人意向所利用這一事實。蔣介石也知道救國會的抗日運動是具有反蔣的意味，所以他感覺到必須一面鎮壓救國會，而一面更進一步，自己也以抗日姿態來壓倒救國會的抗日宣傳。因此，儘管蔣介石和各個反蔣黨派各具不同的意向，但都走上擁護抗日的道路。兩者間暗鬥，所起的作用正如向高潮推動抗日運動的推進機。因此抗日運動的高潮進展，並非自然的，而是「人工的」。這樣結果，抗日運動的浪潮突然達到威脅蔣介石及大金融資本家的政治地位之程度，即抗日運動的發展已經造成足以引起中日戰爭的形勢了。如抗日戰爭爆發，則中國沿海都市的大金融資本家及國民黨等的經濟地盤，將完全喪失。深感這種危險的蔣介石，便把救國會的領導者所謂「七君子」逮捕起來。

四 支持抗日的其他成份

在此我們需要敘述一下，國民黨內部兩個主派「歐美派」與「親日派」對抗日運動的態度之不同兩派都是蔣介石救權的台柱。蔣介石在外交政策上，爲了擺脫經常由對立的英美與日本所發生的困難國際形勢，則他不能不坐在「親日派」與「歐美派」的兩匹馬的車上。有的場合，把前者放在前面，有

的場合，把後者放在前面。但這兩派都是蔣介石政權的安定力，這一點是不變的。兩派對於中國共產黨都是有充分的戒心。因此他們看到，上海的急進份子小資產階段由於抗日運動的媒介，而與中國共產黨的運動合流，因而會引起中日戰爭的危險，於是他們便和蔣介石一同從事鎮壓救國會的工作。但「歐美派」同時又不願「親日派」讓蔣介石同日本妥協，中日妥協，則「親日派」也有取得政治領導權的可能性，那末「歐美派」人就有落到「親日派」的下風的危險。所以「歐美派」在某種程度上爲了牽制「親日」，就利用抗日運動。歐美派的這種態度，即是英美金融資本家的態度之反映。

英美也是資本主義國家，當然不希望中國赤化。從這一見地出發，英美人也不希望含有中共勢力擴大可能性的抗日救國運動之發展。

然而他們也不能想不到，假如與這種救國運動的浪潮背道而馳，那末擁護自己在華利益的歐美派及蔣介石，就會失掉政治地位。英美不僅怕中國共產黨擴張勢力，同時也怕日本在華擴張勢力。因此，問題即在於那一種危險對於英美的在華利益，更較厲害。而英美根據當時的客觀形勢，認爲日本在華伸張勢力的危險，遠較中共厲害。正當抗日救國運動最盛時期，日本則以廣田三原則來逼迫蔣介石，所以英美便利用抗日運動，想藉此來壓迫日本對華的要求。上海，香港等地的英文報紙社論，從最初就袒護抗日運動，就是這個道理。且上海的「中國呼聲」(Voice of China)等則直接與抗日團體發生聯系，更會支持它。

英美的這種態度，是由於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低潮，以及共產主義的蘇聯傾向國家主義化，而安心的表示，特別是由於認爲目前中國共產黨尚無赤化整個中國的力量，而抱此種態度。英美對於

中共的這一估計，一面影響了整個歐美派，同時也影響了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的方針，被資本主義國家英美的態度所影響，這一點在理論上也許難以解釋，但如看到蘇聯本國的外交方針，好像已放棄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政策，而以國家社會主義為基礎，在這種情勢中也就不足為怪了。當時中國共產黨最高領袖毛澤東，對美國新聞記者斯諾所講的「中國人民國防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完全報答英美信賴的十足表示。例如，他說：

「對中國表示友誼的各國，中國願以和平方式談判相互間的利益。對於這類列強，中國準備將在比現在更廣大的範圍內合作。……」

對於日本，中國將以解放戰爭的行動，撤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沒收日本一切在華財產，取消日本在我國的特權，租界和勢力，至於我國和其他列強的關係，我們共產黨人決不主張把中國置於不利的國際地位。中國取得真正獨立的時候，合法的外國商業利益或許比從前還大。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如一下獲得真正的解放，即等於解放其偉大的潛在力，從事於各方面的創造活動，必能改善全世界的經濟，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準」。

在這篇宣言中，毛澤東一句話也未提及收回英美租界，這是值得注意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宣言，放棄土地革命政策。（這是暗示托洛斯基的批判：說中共爲了蘇聯一國社會主義，而犧牲了中國革命）。總之，這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爲了證明自己對中國資產階級及英美帝國主義絕對無害而採取各種手段。當然中共的這種政策，是聯合國民黨及英美帝國主義，企圖形成對日抗戰的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方針，同時也是蘇聯最高方針的具體表現，斯大林前此曾用所有方法，安定蘇聯的國際地位。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對立失掉平衡時，則本國表示願參加某一方面的姿態，而加其對立；但其對立激化，想把蘇聯捲入漩渦時，則蘇聯召回主其者，於是便逃出國去。東方召回鮑格莫洛夫大使，西方召回李特維諾夫大使，可以說，全都是這種政策的明顯例證。

鮑格莫洛夫大使在中國抗戰前，打算用盡所有方法加強中國國民黨的抗戰決心時，他不理解斯太林的根本精神，而曾担保說，如中國起而抗戰，則蘇聯立刻參加戰爭（這一問題詳記於當時外交次長甘介侯的手記上，發表於抗戰後）。當斯大林擔心到這會引起日本的憤慨，而武裝執行防共協定時，鮑格莫洛夫被召回而受處分。

總之，蘇聯的方針為本國境安全計，則動員中國的一切力量參加反日，以牽掣日本的防共協定。因為這一點，即使讓中國共產黨在主義上多少讓一點步，這都算不了一回事的。不能否認，蘇聯的這種政策，對不與蘇聯國境直接毗連的英美，以及對中國國民黨的一部份，尤其對歐美派等，是一服安心劑。

五 西安事變

歐美派雖曾利用抗日運動，同時他們又深知其危險，所以未到被迫表示最後決心的西安事變以前並未積極參加任何方面的活動，與此相反的親日派，雖有意積極對日交涉，但當和日本交涉過於深入時，則抗日運動更鬧起來，所以很怕被利用作反蔣的口實。就是爲了這種關係，歐美派與親日派，都對於抗日運動進退維谷，不知所措。汪先生所提出來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口號，也正是由這種

左右爲難的局面裏所產生的南京政府之苦衷。

但國民黨當前的進退兩難環境，却不幸由西安事變而打破。靜水在冰點下四度是不結冰的，但在冰點下的靜水，如加以刺激的時候，例如投下一塊石頭，則立刻結冰。西安事變正如對中國政界上投下的一塊石頭。由於這一行動，而打破了政府內部的各派均勢，而政策就突然由反共變爲聯共。但如認爲西安事變，單純是蔣介石與張學良的私人關係所釀成，那就是錯誤的。西安事變是把過去以「反共」爲分水嶺而劃分中國各派政治勢力爲兩個陣容，現在重新以「抗日」爲分水嶺而再劃分。在此我要簡單地敘述一下，這一事變首先是打算破壞國民黨內的歐美派與親日派的勢力平衡。

例如當蔣介石被張學良監禁起來的消息一傳到南京時，親日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則連絡張羣的政學系及改組派，企圖以武力討伐張學良及共產黨爲口實，而實行組織大政變。這批親日派的意圖，是想乘此機會清除南京政府內部的歐美派與親蘇派等勢力，是想與德義軍事顧問計劃建立軍權政治。結果想犧牲蔣介石，所以事實上，這是對抗西安赤色政變而計劃的南京白色政變。

這一白色政變，從其成立過程上說，當然，反對蘇聯及英美，企圖把南京政府放入全體主義國家裏。因此，這種計劃之所以容易使中國內外的一切民主主義份子結成一個反對他們的聯合戰綫，是一件極自然的趨勢。對於何應欽的政變計劃，反對得最厲害者是歐美派的宋門一家。尤其宋美齡主張「蔣介石的生命與國家生命有不可分的關係」。爲了阻撓何應欽的武力討伐西安，宋美齡曾動員宋子文，孔祥熙，宋慶齡等。

蘇聯也曾勸告中國共產黨平安釋放蔣介石。當然中共內部也有不喜歡生放十年來的宿敵蔣介石的

份子。但周恩來也和毛澤東說，如殺掉蔣介石，南京政府則落於反共的掌握，如再開始內戰則反給予一個好機會，於是說服了那些願殺蔣的人，全體共產黨員的步調，由周恩來的解說而統一起來。結果周恩來以全權代表的資格斡旋蔣張間所發生的問題。但斡旋周恩來與蔣介石之間的，是英國顧問端納，這一點是極有意義的。在本文前面曾提過的「亞洲內幕」中，對於這一事實極饒興味地說：

「交涉完全陷於停頓時，端納來到蔣夫人處說，只有一條解決的道路，也許對於你的丈夫是一件難事，即有一位共產黨員想和你和領袖會一面。這是一件驚人的要求。領袖和夫人在近十年來，都未曾和共產黨員談過話。相反，且在這一期間，他們曾在全中國領土上追擊過共產黨員。和他們是勢不兩立的敵人。然而本來夫人就是有銳利的政治感覺。她比較上抑制得住自己的衝動。她馬上改變態度答應與周恩來會面，他們締結了新的協定，於聖誕節那一天釋放了蔣介石。並未曾發生最後的可怕事件。蔣的一切都在楊虎與周恩來的掌握中。蔣夫人雖然受到共產黨的援助，但仍然對於事件有所不平，所以關於這一最後的鬥爭與妥協，在她的著作中一點也沒有提到。這就是夫人決不提周恩來的理由。」

歐美派儘管討厭共產黨，但仍不得不與它合作，這一點表現於宋美齡的最後態度中。他們決不希望國共合作。他們儘管討厭中共，但若不與之妥協，則他們自身的黨內支配地位，將有被南京的何應欽，張羣等反共親日派集團剝奪去的危險。所以不得已而與共產黨妥協。

這樣產生出來的國共合作，抗日政權以此為基石——是對反共親日派的反對派勢力之大聯合。然而其性格，則當然是聯共抗日。因此，蔣介石回到南京後的第一步行動，即命令駐陝中央軍撤退，停